

以創新推動發展 「東方明珠」煥發光彩



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25年來，香港經歷了發展與挑戰，我本人也從當年在港求學的青年學子，成長為今天的大學講座教授，並晉身立法會議員。無論是當年的「學生港漂」、「海歸」，還是今天的院士學者、代議士，我個人的人生已經同香港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



孫東 立法會議員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講座教授

我是1994年初到香港的。我當時從北京清華大學的博士生課程，參加了國家教委（後改組為教育部）的一個公派留學項目，來到香港中文大學系統工程攻讀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機械人與自動化。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是香港高等教育飛速發展的黃金時期，香港高校與國際接軌的濃厚學術氛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中大三年學習期間，中大先後經歷了諾貝爾獎得主高錕和李國章兩任校長。緊張學習之餘，我也找機會接觸了校園以外的世界，感受了香港各界迎回歸的喜悅氣氛，也見證了回歸前那幾年香港所經歷的政治風雨。1997年我順利完成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學位，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繼續開展博士後研究。在加期間，我一直心繫香港，留意着返港發展的機會。兩年多之後，我終於從香港城市大學拿到了助理教授的職位，於2000年1月返回了我思之念之的這座城市。

目睹深圳創新科技崛起感慨萬千

2000年前後，恰逢全球資訊科技熱，香港亦不例外，對發展科技充滿了熱情和期待。當時香港特區政府推出「創新及科技基金」，並由剛成立的創新科技署負責管理，立刻吸引了全

城的目的。2001年我也成功拿到了我在香港的第一個創新科技項目資助，並以此為基礎，於2003年在香港科學園創辦了一間科技初創公司。在接下來的十年，我一邊在大學做科研，一邊在科學園忙公司業務，十分辛苦。這十年間，我體會到了香港的科創發展由熱轉冷，也目睹了一河之隔的深圳在短時間內迅速崛起為一座頗有規模的科技創新城市，不禁感慨萬千！

2013年我升任為城市大學講座教授後，便開始更加專注於大學的教研與管理工作，逐漸淡出了科技公司運營業務。我的研究方向也從以前的機械人與自動化逐漸延伸到生物醫學工程，並在香港城市大學先後創辦了生物醫學工程專業和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我領導的科研團隊主要研究應用微機械技術進行細胞自動化操作以實現精準醫療。由於我在這一新興跨學科領域所作出的貢獻，先後被授予了加拿大工程院院士、歐洲科學與人文學院院士、美國IEEE Fellow等榮銜。

過去25年來，香港砥礪奮進，也在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發生巨大變遷。我本人親身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七一大遊行」、2005年「07-08政改方案失敗」、2012年「反國教事件」、2014年違法「佔

中」以及2019年修例風波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世界上好像沒有哪一座城市如香港這般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遭遇了如此多眼花繚亂的「政治洗禮」，而且幾乎每一個事件都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

借「一國兩制」優勢建科創發展平台

透過這些事件，我看到了國際地緣政治在香港的激烈博弈，也深刻體會到了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艱巨性與複雜性。「風雨過後見彩虹」，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完善選舉制度，香港逐步實現了由亂到治的重大轉變，社會發展漸露曙光，開始邁上由治及興的關鍵征程。2021年底，我更是史無前例地參加了香港立法會選舉，親身踐行到新選舉制度這一偉大實踐中，也開啓了我人生的新篇章。

我出身內地，在香港讀過書，之後又負笈海外，幾十年來去過世界很多地方。在我眼中，香港依然是全世界華人最好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本人也非常珍惜香港當前來之不易的穩定社會環境。我選擇扎根香港，除了因為喜歡香港的風土人情、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圍，更因為香港可以借助「一國兩制」的優勢構建良好的科創發展平台，施展個人所長。候任特首李

家超也曾指出，全面提升香港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關鍵在於推動香港科創發展。適逢國家發展日新月異，香港能夠有幸乘上國家發展的高速列車，參與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深圳、廣州等周邊城市優勢互補、協同發展，這些都為香港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香港需要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如同當年的我一樣，在獅子山下安居，在「一國兩制」的天空下成就美好人生。

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風雨洗禮，今日香港變得更加成熟，正煥發出巨大能量，締造更美好的未來。「以科學引領創新、以創新推動發展」正成為當今世界科創發展的新潮流。二十年前科網熱潮興起時，香港遭逢社會事件頻生，錯失了很多機會，着實令人可惜。今天，香港重新出發，國家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這為香港帶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香港發展本身更需要科創產業這一經濟發展新引擎。香港只要做好科創發展的頂層設計，大膽進行科創制度與機制的改革創新，善用其基礎科研以及國際化的優勢，積極培育及吸引人才，引入更多高增值、高技術含量的產業落戶和扎根香港，建設完善的科創生態圈，香港這顆「東方明珠」必將煥發出更加奪目的光彩。

優化薪效制度 釋放公務員潛能

黃元山 博士 立法會議員

香港進入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政府管治班子必須是德才兼備的堅定愛國者，公務員團隊也要與時並進、積極有為、靈活變通，履行好治理香港和貢獻國家的使命。要達到上述目標，筆者認為應改革和優化公務員的管理機制，設立賞罰分明的評核制度，提供並強化相關的誘因，激勵公務員力爭優異表現，以更加積極地服務市民。這是提升政府施政效能的基礎。

月初立法會大會就題為《改革公務員制度，提升政府效能》的議員議案進行辯論。筆者支持議案中促請特區政府改革公務員升遷解僱制度。其實，有關改革及優化公務員管理制度的議題，早於20年前已有討論。

薪酬與績效掛鉤是大勢所趨

2001年就公務員薪酬政策和制度檢討成立的專責小組，便已提出了相關建議，主要包括：1. 就公務員工作表現制訂「關鍵績效指標(KPI)」，引入薪金與效能掛鉤（薪效掛鉤）制度、彈性的薪金升降元素，以確保工作質素與效率；2. 下放薪酬管理職能，讓部門有更多自由按本身需要管理薪酬事宜；3. 研究精簡職級架構，以便更靈活地在部門內或部門之間調派人手。

可惜，當年在小組提交報告後，就上述建議的跟進工作進度緩慢，其後也未見特區政府有規模地改革公務員制度。

香港面對區內以至環球的競爭越見激烈，「慢進也是退」。鄰近不少國際或城市，早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已把「激勵元素」納入其公務員績效的管理制度中。新加坡與韓國分別在2012年與2015年進行公務員改革。

仔細梳理星韓的改革，有一定共通點：1. 薪酬與績效掛鉤（「薪效掛鉤」）制度；2. 為表現評級設定限額或相對排名（即不會出現評核績效時「人人攞A」的情況）；3. 就公務員不當行為的各個紀律處分程序設定時限等。

星韓的公務員管理制度改革，有助激勵公務員的士氣。我們希望香港亦設立一個多勞多得、能者居之的公務員管理制度，確保公務員工作的質素與效率。

檢討公務員銜用委員會組成

事實上，近日主導公務員薪酬調整的「薪酬趨勢調查」初步結果出爐，其中高層公務員薪酬趨勢淨指標達7%，引來不少爭議。筆者相信，這個結果除了和疫情下整體經濟受創的大環境相左之外，社會大眾對有關結果的質疑，也源於對個別政府部門工作表現參差的考量。毋庸置疑，香港有很多優秀的公務員，但如果因為陳舊、過時的制度，影響特區政府的整體效能，則實在太過可惜。

另一方面，要有效改革公務員制度，筆者亦建議由優化公務員銜用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做起，改革舊制度、引入新思維。

眾所周知，政府政策局的人事權和財政權都掌握在資深政務官的手中，而公務員銜用委員會則手執政務官的升遷和懲處大權。雖然委員來自不同背景，但回歸以來，委員會的主席也一向由退休的資深政務官擔任。

更有甚者，根據《公務員銜用委員會條例》，任何立法會議員，均「不可被委任為委員會主席或委員」。筆者翻查資料，發現不只主席一職例不能由立法會議員出任；絕大部分的情況，委員會的委員也不會包括立法會議員。如此刻意地連前立法會議員亦摒除於委員會之外，實在令人費解。

筆者明白並認同，委員會的職能是處理有關公務員團隊升遷與懲處，因此成員包括對於公務員制度運作具備較深了解的退休資深政務官，安排合理，但委員會的主席由退休資深政務官擔任的慣例是否一定要維持呢？因此，筆者促請政府檢討公務員銜用委員會的組成，尤其是考慮由其他社會人士擔任委員會的主席，作為公務員管理制度改革的第一步。



支持取消對沖

保障打工仔權益

立法會正在審議「取消強積金對沖的草案」。取消強積金對沖已討論近20年，在對沖機制下，不少打工仔深受其害，取消對沖受到大眾關注。

強積金計劃自2000年12月開始實施，政策原意是設計一項退休保障計劃，強制要求僱員和僱主雙方共同供款以成立基金，待僱員年滿65歲後才可取回相關供款，協助打工仔儲蓄一筆可觀的退休金，達至「老有所依」。

但是，現有對沖機制削弱了強積金的退休保障力。根據現時強積金條例規定，僱主可提取僱員強積金中的僱主供款，以繳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即變相令僱員得不到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退休生活保障被無情剝削，社會上諷刺「對沖機制」是「貼錢炒自己」。

參考過往積金局發布的「強積金計劃統計摘要」，如果按「抵消遣散費」加上「抵消長期服務金」計算的對沖金額，2019年合共對沖了46.7億元；2020年對沖了57.1億元；2021年對沖更高達66.5億元。由此可見，不少打工仔的血汗錢和退休金因對沖機制而被沖走的情況日益普遍和嚴重。為避免更多打工仔的退休保障被蠶食，香港進入「愛國者治港」的新時代，管治者有責任支持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增強對打工仔權益保障，舒緩長者貧窮問題。

劉學康 工聯會社區幹事 政策研究員



有部分人士擔心，現時香港經濟低迷，現階段推行取消強積金對沖，會引起商界擔憂和反對。因為，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僱主需要預留大筆金額繳付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部分僱主為減輕負擔，有可能在取消對沖機制實施前，提前遣散部分僱員，令香港出現一波不必要的裁員潮。更壞的情況是，有中小企因無力支付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選擇結業，令香港經濟、失業問題雪上加霜。

筆者理解有關擔心，但此次取消強積金對沖草案的細節上，已有慮及上述情況，並作出相應安排。

首先，即使此次順利通過草案、完成修例，落實時間最快亦要等到2025年才執行，僱主有一段充足時間準備，相信屆時本港經濟已有好轉；其次，條例定明政策實施頭三年，即到2028年之前，僱主會受到政府補助，只需向被解僱僱員提供3,000元遣散費，其間不會為僱主帶來額外開支；另外，政府亦會設立一個為期25年的資助計劃，為僱主提供足夠的過渡性配套。上述安排正是為了避免出現社會擔心的問題。

取消強積金對沖終於來到最後的立法階段，希望在新選制下產生的立法會議員有決心和擔當關顧民生，共同合作維護勞工權益。

何漢權 教育評議會主席



做好學校自測

保障師生安全

教育動靜

儘管整個世界都十分期望困擾全球已近3年的新冠疫情退潮，病毒銷聲匿跡，但事實擺在眼前，病毒仍然廣泛地存在，且繼續以變種再變種的方式，威脅着整個世界，全球染疫的人數仍在增加，因疫死亡的人數還未停止。世紀疫情對世界的重擊傷害，可想而知。另外，各國在抗擊疫情的同時，亦要照顧人民生活的正常化、經濟活動恢復常態化，這是各國各地政府與人民共同的考量大方向。

香港第五波疫情，幸賴國家的醫療援助隊南下支援，又大力助港速建方艙醫院，各類防疫物品迅速到位，加之絕大部分的港人守法、團結、合作，香港醫療人員日以繼夜、同心協力壓住來勢十分兇險的病毒傳播，令疫情穩步下降受控，限聚措施得以放寬，市民生活恢復正常，市面生氣復現。

然而，染疫人數近日又徘徊在每天500宗，按衛生署防護中心公布，現時的疫情已呈上升趨勢，病毒有效繁殖率達1.35。要預防第六波的來襲，最佳的方法當然是每一個香港市民，要為己為人，盡速打足三針、甚或以上，從而盡快建立免疫的屏

障。近日，再有醫生提出要進行更大範圍的自測，盡量找出隱形傳播者。筆者完全同意此一說法。

香港經歷嚴峻的疫情，特別在第五波衝擊之後，教育局規定，學校復課期間的全校師生，每天必須自檢證明「陰性」屬實，方可回校上課，這防疫措施是可取並成功的。學生在未返學前，因自檢「陽性」不用返學校，「呈陽」後又能盡快得到治療，利人利己。就筆者所知，絕大部分學校檢查學生自我檢測相當嚴謹，除每天早上查核結果外，於小息期間，很多學校都為師生在校提供安全的環境，再作抽樣抽查，以防學生早上返學前檢測有誤，甚或有「懶檢」的情況出現。

疫情仍在繼續，可見的將來，特區政府應考慮定期的更大範圍的自測，再配合現今行之有效的屋邨「圍檢」方法，當大原則確立，技術細節不難解決。筆者始終深信，香港市民的公德心與責任感，是經得起考驗的，說到底，誰不想限聚措施進一步放寬？誰不想通關有明確的日期？誰不想香港動感之都的動力再次啟航？

落實管治新思維 提升香港競爭力

莊紫祥 深圳市政協委員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基金會主席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為香港《文匯報》「我們的25年」論壇專欄撰寫文章，回顧自己多年工作領會到的管治四要點：必須要有迎難而上的精神找出解決困難的方法，要重視執行的結果，建立團隊精神的重要性，必須具備風險管理的憂患意識。這正正回應了當前社會關切，進一步為香港未來的施政勾畫了明確的方針和方向。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香港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如房屋土地、醫療養老、青年發展、產業創新等等，一直未能得到真正的解決。李家超從政府理念和做事方式作出變革，提升施政效率，建立團隊觀念，強化共同解決問題的團隊文化，加強執行力。此舉最終會惠及社會和市民，港人必樂見。

香港未來要邁步向前，必須要妥善應對內外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及挑戰，更要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機遇，以及把握內地市場的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隨着新選舉制度的完善與落實，我們都渴望新管治帶來新氣象，深信特區政府在李家超的新管治思維及作風帶領下，將能凝聚社會各界力量，與香港市民攜手協力再創高峰。建議新特首及其團隊需進一步吸引更多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年前往內地工作，把握內地的發展機遇，加強香港和內地融合，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奠定香港發展穩固的基石。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25年的實踐證明「一國兩制」取得成功，是香港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保障。香港在過去三年克服了重重困難，建立了「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力量，未來五年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時間，相信新一屆特區政府會強化管治，做到以民為本，在「以結果為目標」、全面提升競爭力的方向下，確保香港更有能力應對不同的挑戰，幫助香港主動融入國家大局，帶領市民開創新篇，「一國兩制」必將行穩致遠，香港明天必會更好！